

何炳济/著

新疆农牧民 社区田野调查

XINJIANG NONGMUMIN
SHEQU TIANYE DIAOCHA

查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农牧民
社区田野调

查

何炳济/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农牧民社区田野调查/何炳济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228 - 11075 - 9

I. 新... II. 何... III. ①农业经济—经济发展—调查报告—新疆②畜牧业经济—经济发展—调查报告—新疆 IV. F32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426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刘堪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2825887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0 千
插 页 8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何炳济 江苏淮安人,1952-1958 年就读于上海市上海中学,1963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赴新疆,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1980-198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修社会学,兼作费孝通教授秘书,参与费老主持的《社会学概论》的编写。1982-1987 年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其间,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作了大量民族、宗教田野调查。1987-1995 年退休前,任新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专业技术职务为编审。参与编撰的著作有《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1988 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2002 年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曾任新疆社会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

责任编辑◎贺灵

整体设计◎刘堪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本书作者在北京学习社会学，聆听费孝通先生讲授关于社会调查的哲理。左一为费孝通先生，右一为何炳济。

2002 年 6 月 29 日，《社会学概论》编写组成员与费孝通先生在天津宾馆合影。

左起：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上海大学沈关宝教授、中山大学丘士杰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贾春增教授、费孝通先生、新疆地方志编委会何炳济编审、南开大学杨心恒教授、武汉大学周运清教授、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



1998 年 5 月 7 日，本书作者探望费老。图为在费老书房里向老人家汇报新疆的田野调查情况。右一为费老，左一为何炳济。



1997年11月27日，本书作者拜访铁木尔·达瓦买提，为撰写《从农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搜集素材。左一为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右一为何炳济。

1983年5月，赴英吉沙县乌恰公社包孜洪十五大队调查，从县城至调查点，路过一座水库。左一为县委统战部部长王建夫，左三为何炳济，左二、四为协助调查的县委同志。



1983年5月，在新源县那拉提公社调查，抽空在牧场牧民毡房旁留影。

1983年5月，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牧区调查时，在毡房旁与干部、牧民合影。

前排右一为本书作者何炳济，右二为古丽夏提（哈萨克族）。



1987年6月，在莎车县阿热勒调查，与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梁鸣达（中）、莎车县委办公室主任徐万胜（左一）合影，右一为何炳济。

1984年6月，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沙尔布拉克调查。图为时任县委书记李桂茂（左四），送我们至调查点，安排调查活动。





1987年5月,调查组同志乘坐马车外出调查。图为马车行走在阿热勒乡间路上。马车上坐者左一梁鸣达,左二何炳济。

1987年夏,在莎车县调查。图为调查组成员在阿热勒乡文化室内小憩。

左起:何炳济、李铁成、苗剑新、阿尔曼(哈萨克族)、张丽红、续西发、赵恩儒、田新生、努尔·买买提(维吾尔族)。



1988年,疏附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杨静安(中)在做家庭访问。

1988年,何炳济(左二)在疏附县站敏乡农民家访谈。



1988年,梁鸣达(左二)在做家庭调查。

1988年,在疏附县农村访问村民、基层干部。左四为何炳济。





1995年5月，在乌苏县一回族农民家做家庭调查。左一为何炳济。

1995年6月，在乌苏访问养鱼专业户。图的水面为养鱼池。中立者为养鱼人，右一为何炳济。



1995年5月4日，在乌苏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谢万祥（右一）陪同下，到克拉玛依市考察市场容量。接待我们的是克拉玛依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新疆石油志》主编王连芳（中）。左一为何炳济。

20 世纪 80 年代，土地分到户后，人们又捡起了旧式单铧犁，主要用牛或驴拉。有时也有用人拉的。



20 世纪 80 年代，南疆乡镇早已有现代化的榨油机，但农民们为了节省加工费，还在使用旧式的榨油方式——用一种类似木桶或石臼样的器具，把油料放进去，用一粗木棍在桶中转动挤压。当地群众称为“居孜孜”。图为用牛力转动木棍。

1988 年冬，图为疏附县巴扎上出售的缺少碘质的土盐块。因为便宜，当时，南疆农民普遍用这种盐来调味，因此，不少人患上一种叫“大脖子”病的不地方病。





20 世纪 80 年代，南疆巴扎上，普遍出售这种陶瓷碗，粗糙色质差，但便宜，所以，很受农民欢迎。



20 世纪 80 年代，在疏附县农村，一位贫困农户女主人的全部财产都在眼前。



20 世纪 80 年代，疏附县农村一农户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数这一包棉花。

自序

《新疆农牧民社区田野调查》系本人与我的同事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按照费孝通教授提倡并终身实践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南北疆农牧区,进入农舍、毡房、地头、牧场、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清真寺和活动点,仔细观察,并与众多农牧民、干部、教师、信徒、阿訇零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心声,除了口问手写外,还认真地填写了调查问卷。每次调查,都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调查报告,都是当时新疆南北疆被调查点上农牧民生产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具有普遍意义。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在世居的 13 个民族中,有 7 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陆续迁入。这样,我国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新疆都有了他们的成员。在新疆现有的 46 个民族成分中,除了汉族中的少数人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外,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就是说,新疆的信教人口要占新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本书通过对伊斯兰教的考察,表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包括宗教人士——阿訇在内,他们在爱教的同时,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积极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事实证明,宗教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复杂性、国际性的特点。因此,必须谨慎对待。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1989年8月27日接待笔者时所说的一席话(见《维吾尔村农民宗教生活见闻三则》序),语重心长,是我们研究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必须遵守的原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也曾对我们的调查报告表示了肯定与赞赏。

农民与农村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新疆的南北疆农牧区显得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新疆提出农牧区脱贫致富的口号,有些地、县的建设规划不是从本地区的资源、市场、人才等具体情况出发,不太注意农牧民自身条件,没弄清本地区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太重视社会人文环境建设,盲目攀比,不顾自身条件,模仿沿海地区农村的发展路子,侧重于盖厂房,买机器,搞现代化工业,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一段弯路,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土地重新分配到户,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个家庭状况就决定了家庭生产的效益。依据当时农牧区的资金、科技、人才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首先只能是发展家庭农副业生产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这也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必由之路。当时南北疆农牧区经济,基本上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谈不上以商品为目的的生产(虽有,但很少)。此外,在南疆的和田、喀什两地农村调查点上,由于早婚、近亲结婚、老人家庭等原因造成的不完全家庭、弱智家庭和缺失劳力家庭,各占全村总农户的十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家庭,既无能力脱贫,更没有希望致富。这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也是与民族宗教习惯相联系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为人们熟视无睹。然而,这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试想,若有占农户三分之

一的农民摆脱不了贫穷,农村何以致富奔小康,脱贫致富问题如何解决得好?

《新疆百岁老人问题探究》一文,纠正了一个错误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新疆的百岁老人特别多,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百岁老人为3857人,其中新疆有865人,占全国百岁老人总数的22.40%,按平均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百岁老人计算,新疆最多。因此,1958年10月,国际自然医学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在东京宣布,把中国新疆列为世界长寿地区。实际上,新疆百岁老人没有那么多。本人对此作过周密的调查和详细的论证。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必须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

本书是本人与众多同事共同合作的成果。先后参与这项工作的有: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梁鸣达;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唐世民、陆东光、赵恩儒、马苏坤(回族)、古丽夏提(哈萨克族)、陈国光、李铁成、努尔·买买提(维吾尔族);民族研究所的李泽、苗剑新、郭泰山、续西发、张丽红、阿尔曼(哈萨克族)、李晓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翻译处的库来西(维吾尔族);还有新疆大学中语系维吾尔语专业三年级一个班的30余位同学。同时,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的地委、县委、乡党委领导与各级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各地各级统战部门往往抽调得力干部配合工作,有些地县统战部的领导还亲自参与调查。其中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喀什地委、和田地委、阿克苏地委、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以及英吉沙县委、墨玉县委、疏附县委、霍城县县委、新源县委、伊宁县委、吉木萨尔县委、米泉县委、阿克苏市委、乌苏县委等单位。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以上各单位的领导与协助调查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田野调查是一件挺艰苦的事情,为了便于观察,起码要与被调查对象(干部、群众、阿訇)直接接触,与他们同吃同住。因此必须要克服城市生活习惯,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的南北疆农牧区,有些地方连喝水都很困难。汉族同志去到农牧区,一时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饮食。与群众同饮食,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尊重。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谈得上工作;只有尊重群众,群众才能跟你说实话。新疆地广,农牧民住户分散,入户调查,一天走几十里路并不稀罕,我们下去,一般没条件有汽车乘坐,有时租用驴马车,有时乘坐手扶拖拉机。乘手扶拖拉机,走上一段路,浑身都沾满尘土和从拖拉机烟囱喷射出来的油烟灰与油污。有时,辛辛苦苦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却找不着访问对象。其时,农牧区的卫生条件差,我们每次下去,无不是虱子满身爬。不论男女调查员,每天早晚捉虱子,竟成了第一“要务”。洗澡成了奢侈的欲望。有的地方,还没有通电,晚上开研讨会、整资料,只能依赖煤油灯。凡此种种,虽然辛苦,但每次调查,大多数同志都能坚持到底,而且能保持饱满的情绪。如若没有这种吃苦精神与科学认真的工作态度,我们的调查,就会一事无成。所以,本人对与我一起完成多次调查任务的同事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们的感激是由衷的!

同时,本人还要感谢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谷苞、陈华、维古尔·沙依然、何达文、阿吾提、邵纯、贾合甫·米尔扎汗和分管宗教研究所的院领导曹玉泰等同志,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领导钟英、马子健、努尔穆罕默德·多莱特同志,感谢新疆社会学会,感谢他们对我们社会调查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三

当然,本书记录的社情,距现今已经20来年了,这20来年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